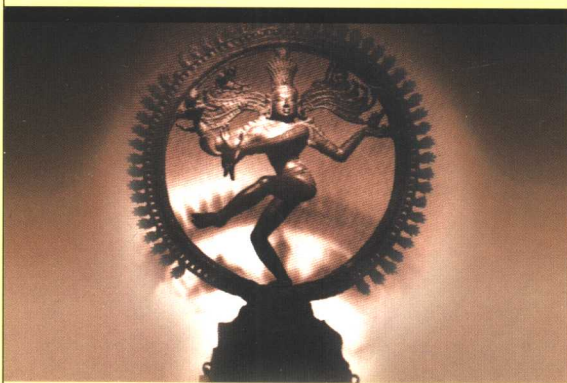


简明东方文学史



孟昭毅 黎跃进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简明东方文学史

孟昭毅 黎跃进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明东方文学史/孟昭毅,黎跃进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

(21世纪外国文学系列教材)

ISBN 7-301-09283-0

I. 简… II. ①孟…②黎… III. 文学史—东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I3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7366 号

书 名: 简明东方文学史

著作责任者: 孟昭毅 黎跃进 编著

责任编辑: 袁玉敏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283-0/I·074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排 版 者: 北京红金牛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280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言

21 世纪的学术之门已经敞开,人们迫切想了解、学习、研究东方文学、东方文明、东方文化的热情有增无减,这本《简明东方文学史》便应运而生,并成为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学术产物。

这本《简明东方文学史》之所以冠以“简明”,是因为东方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虽然前人云:“书越读越薄,越写越厚”,但事实上,这种教材的编写厚度是要有限度的。当许多人,尤其是初学者,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种知识茫然不知所措时,“简明”的教材是颇能吸引他们的眼光的。“简明”不是“简易”,而是重点突出;“简明”不是“浅白”,而是条理明晰,这也是这部书编写的一个重要原则。

“东方文学史”中的“东方”一词,最早是根据欧洲的习惯用法。英文、德文、法文原字都是“Orient”,这个字又来源于拉丁字“Orient”,意思是(太阳的)升起,进一步就演化成太阳升起的地方:东方。从欧洲人的眼里看,整个亚洲都在东方。进入 20 世纪,“东方”逐渐由一个纯粹普通的地理概念而演化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政治区域概念,成为与西方对应,并与之相互参照的具体对象。当代“东方”一般指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并越来越有了明确的指代对象。

东方文学史作为大文学学科之一,形成相对比较晚。有的学者认为,20 世纪初俄国图拉耶夫的《东方文学论文集》等论著的问世,标志着东方文学史已发展成为国际上一门独立的学科,但那时的东方文学研究主要是指东方古代文学研究。中国成规模进行的东方文学史的研究与教材的编写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当时有些高校是出于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实际需要,虽然中途因“文革”而中断,但是 1978 年以后,各种东方文学史的教材又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至目前已达 30 多种。

这本《简明东方文学史》除了强化史论结合、文化分析与艺术分析等以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增加了对中国与周边国家文学交流史实的描述,给读者一个双向互动的整体感,在拓展了学术视野的基础上便于发现和总结出东方文学史总体发展的规律性,这对于当前东方文学史教材的雷同现象无疑是一个新举措。另外,当代东方文学史的下限时间也比以往的教材有所延伸,并新增加了



对 2003 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库切作品的分析,反映了东方文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吸收了学界的最新成果,使这本书有了自己的新的本体定位,这无论对于哪个层面的读者来说都是一个福音。

尽管如此,由于东方地区民族众多、语种复杂、资料匮乏,而编写者的水平又有限,因此,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我们勇敢地献出自己的成果,真诚地欢迎学界的同仁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我们谨以此书献给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领域的师友们!

孟昭毅 黎跃进

2005 年 4 月 18 日

目 录

绪 论 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	1
第一章 上古东方文学	11
第一节 上古东方社会文化特点与文学概况	11
第二节 美索不达米亚史诗与《吉尔伽美什》	21
第三节 印度史诗与《罗摩衍那》	28
第四节 《旧约》文学	35
第五节 上古东方文学交流	40
第二章 中古东方文学	48
第一节 中古东方社会文化特点与文学概况	48
第二节 迦梨陀娑与《沙恭达罗》	60
第三节 紫式部与《源氏物语》	66
第四节 萨迪与《蔷薇园》	71
第五节 《一千零一夜》	76
第六节 中古东方文学交流	81
第三章 近代东方文学	94
第一节 近代东方社会文化特点与文学概况	94
第二节 泰戈尔与《吉檀迦利》、《戈拉》	102
第三节 黎萨尔与《社会毒瘤》、《起义者》	110
第四节 夏目漱石与《我是猫》	117
第五节 纪伯伦与《先知》	122
第六节 近代东方文学交流	128
第四章 现代东方文学	136
第一节 现代东方社会文化特点与文学概况	136
第二节 普列姆昌德与《戈丹》	145



第三节	川端康成与《雪国》	153
第四节	陶菲格·哈基姆与《灵魂归来》	160
第五节	赫达雅特与《哈吉老爷》	168
第六节	现代东方文学交流	174
第五章	当代东方文学	181
第一节	当代东方社会文化特点与文学概况	181
第二节	耶谢巴尔与《虚假的事实》	196
第三节	普拉姆迪亚与《人世间》	203
第四节	大江健三郎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208
第五节	马哈福兹与“三部曲”	215
第六节	索因卡与《路》	221
第七节	库切与《耻》	228
第八节	当代东方文学交流	235
后 记		243

绪论 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

文化是文学的母胎,什么样的文化孕育什么样的文学。文学又是文化的“缩影”,素有“小文化”之称。东方文学蕴含着东方精神、东方智慧和东方情操,更是东方审美体系的符号。

一、东方·东方学·东方文学

“东方”是一个有着多种内涵,具有几分模糊又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它至少有下列几种含义:

第一,方位概念。讲方位就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以中国为立足点,中国的东面称为东方,中国的西面称为西方。因而长时期把印度当作西方。唐代高僧玄奘从凉州出玉门关赴天竺,称为“西天取经”,以此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名之《西游记》。

第二,地理学概念。按照国际的地理疆域规定,以西经 20° 和东经 120° 的经线圈,把地球分为东、西两个半球。这样,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都属于东方范围。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不在东方圈内,又把欧洲的原苏联、东欧部分国家包括进来,大洋洲也属东方。

第三,政治学概念。20世纪国际政治关系演变,“东方”、“西方”又具有政治的内容。二战后长时期形成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属于西方,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属东方。而地处亚洲的日本却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成员。

第四,历史文化概念。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亚述人把太阳升起的地方称为“亚细”(意为日出之地),古代希腊罗马人把地中海东岸地区称为“亚细亚”,还分为近东、中东、远东。历史文化概念的东方指除了古希腊罗马之外的几大古代文明发源地,因而包括亚洲和非洲北部地区。

我们这里讲的“东方”,是指亚洲和非洲。它综合上述的历史文化概念和地理学概念的“东方”,外延有所拓展。

“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研究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历史、哲学、宗教、经济、



文学、艺术、语言及其他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研究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各种文化形态:传统的、现实的、精神的、物质的以及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及东方社会进程的规律等。东方学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群体。从学科领域看,有东方历史、东方语言、东方文学、东方艺术、东方宗教、东方哲学、东方经济等分支学科;从区域研究看,有中国学(汉学)、西夏学、埃及学、赫梯学、亚述学、突厥学、日本学、伊朗学、阿拉伯学、印度学、朝鲜学、中东学、敦煌学等分支学科。

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萌芽于16世纪,确立于19世纪。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不乏对埃及、巴比伦和古波斯的描述。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把东方描写成仙境福地,激起西方航海家探寻东方的热情。之后随着西方向东方的扩张,一些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东方,他们编写了关于东方文化习俗的著作。16世纪末的巴黎大学,17世纪的牛津大学开设了近东语言讲座。牛津大学首任阿拉伯语教授爱德华·波考克(1604—1691)所著《阿拉伯史纲》(1650)开创了阿拉伯研究的先河。17世纪末,欧洲的东方学家收集了大量东方典籍、文稿,出版了一批根据东方资料编写的系统性著作,如戴维罗等人编订的《东方文库》(1697)等。18世纪东方语言研究获得发展,东方经典的准确译本出版。中国的《易经》、阿拉伯的《古兰经》、波斯的古经《阿维斯塔》、印度古老的《摩奴法典》等都陆续译出。英国学者威廉·琼斯(1746—1794)开始进行东方语言的比较研究。一些西方国家创办了专门的东方语言学校。

19世纪东方学在众多方面获得突破和发展。首先是系列考古发现和东方古代铭文解读成功。格罗特芬德破译波斯楔形文字,罗林逊对亚述巴比伦古文字的解读,商波利翁发现埃及象形文字。多次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小亚细亚、印度、中国的考古取得成果。其次,东方语言学发展成熟。大型东方语言工具书,自成系统的语法著作出版。如《英华字典》(6卷,马礼逊著,1828)、《梵文字典》(7卷,波特林格等著,1863—1894)、《中俄大辞典》(帕雷底阿斯编,1888)、《梵文文法》(基尔荷恩,1888)、《汉文典》(甲柏连,1881)等。再次,东方历史研究成绩卓著。在汇集资料的基础上编写出东方通史,还有建立东方学研究组织,召开国际性的东方学学术讨论会。1873年东方学家齐集巴黎举行第一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以后每隔三四年举行一次。这些标志着东方学的确立。

20世纪东方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方国家的一批学者加入东方学研究行列,以不同于西方学者的民族文化视野研究东方学,以其材料充实的东方学研究成果,异军突起。西方的东方学也更加深入,趋向客观,各名牌大学都设有东方学系或东方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东方学研究期刊。一些研究领域非常繁荣,敦煌学研究不到一百年,却成为国际显学,汉学、日本学、中医学也因20

世纪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而成为显赫之学。一批经典性的东方学论著出版。东方学家的国际性合作研究也取得成功经验,如《伊斯兰百科全书》汇集了世界阿拉伯研究的成果。

1993年在香港举行第34届东方学国际会议,一千多名来自各国的东方学者与会,就“中国踏进21世纪的门槛”、“珠江三角洲:潜力与机会”、“亚洲科技史”、“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敦煌研究”、“丝绸之路研究”、“佛教与佛学研究”等专题进行深入探讨。

东方学的发展虽有四百余年的历史,但其局限也很明显,最突出的有两点:

第一,缺少统摄各分支学科的宏观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其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二,西方中心的立场。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这时候的西方在工业革命后迅猛发展,把东方当作他们扩张的对象和倾销商品的市场。东方国家大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种背景注定了东方学是西方人居高临下看东方的产物,带有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和色彩。阿拉伯裔的美国学者赛义德1978年出版《东方主义》一书,对西方东方学的“西方中心”立场作了清理,认为西方对东方的描述,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文艺作品,都存在严重的扭曲,西方人把东方当作异己的“非我”,构造出处处不如西方的东方形象。中国也有学者指出:“由于习来已久的对东方的偏见,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另一方面,东方本身又不无某种令人神往的‘神秘’色彩。说到底,‘东方主义’在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制造的一种政治教义,它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①不仅东方学者有这样具有民族情绪的看法,西方具有人类良知的学者也有同感。沃勒斯坦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是“一种由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所作的社会构造。现在正是这种构造的有效性受到抨击,抨击在三个方面:(1)这些概念不符合经验事实;(2)它们过于抽象,因此消除了经验世界的多样性;(3)它们是带有欧洲人偏见的产物。”他还说:“东方主义确立了欧洲占支配地位的权利的合法性,它在为欧洲帝国主义在现代世界体系内的作用进行的意识形态辩护中,确实起着一种主要的作用。”^②

恐怕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当东方的学者加盟东方学研究的时候,东方学已经形成一套话语体系,即使来自东方文化系统内的东方学者,也难以摆脱已有话语体系的束缚。

① 王宁:《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② 沃勒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读书》1997年第2期。



当然,对东方学已有的成果不能一概否定,几百年里数代学者的努力,并非都心怀偏见,有的出于超功利的个人爱好,有的出于对真理的执著,对东方进行客观、公允的研究与评价。但不管怎样,包括东方文学在内的东方学研究,还需要更为切实、深入的工作,尤其是东方学者,更是任重道远。

“东方文学”作为东方学的分支学科,研究亚洲、非洲的文学现象及其规律。东方文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于20世纪初期。之前的18、19世纪主要发掘整理材料和解读东方古文字。20世纪初葛鲁贝的《中国文学史》(1902)、温德尼兹的《印度文学史》(1909—1920)、汉密尔顿·吉布的《阿拉伯文学史》(1926)和俄国学者图拉耶夫的《东方文学论文集》等东方文学专著出版,标志东方文学已经发展为独立学科。

中国的东方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20、30年代,周作人、谢六逸对日本文学的研究、许地山对印度文学的研究成绩显著,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对东方文学作了较多篇幅的论述。但这还只是停留于国别文学的研究。作为独立学科,中国的东方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亚非作家会议召开的背景下,中国把东方文学作为整体的把握和研究提到学界的日程,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开设了东方文学课程,一批开拓者进行资料搜集整理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东方文学体系的建构。但刚刚起步却因遭“文革”而中断,直到80年代初才重整旗鼓。东方文学列入高校教学大纲,协作编著了几种著作和教材,举办全国性的东方文学师资培训班。90年代我国东方文学研究有较大进展,出版了多种颇有分量的专著。如王向远的《东方文学史通论》(1994,上海文艺出版社)、高慧勤、栾文华主编的《东方现代文学史》(1994,海峡文艺出版社)、季羨林、刘安武主编的《东方文学史》(1995,吉林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当然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中国研究东方文学,中国文学不列入具体的研究对象。可在对东方文学作总体论述和评估时,必须把中国文学成就纳入视野之内。

二、东方文学的文化潜质

东方包括众多民族和国家,各自都有灿烂的历史文明,东方文化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东方几大文明古国都属于河流文明,古代社会经历了大致相似的社会历程;近代以来又大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又有大体一致的历史遭遇。因而对东方社会作总体抽象,能看到其共性。

对东方古代社会的理解,我们借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认为,在古代东方漫长的历史时代里,长期实行“亚细亚生产方式”。对马克思的“亚



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学界存在不少论争。有论者认为受时代和资料的限制,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带有明显的东方社会长期停滞论和为研究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服务的色彩。但目前还没有一种新的东方理论比“亚细亚生产方式”更能说明东方古代社会。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对东、西方社会历史现实进行广泛的考察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概念,是对东方古代经济基础一般特征的概括。亚细亚生产方式既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也不同于拉丁日耳曼封建制,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共同占有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家庭和通过家庭组成的部落或部落联盟)集体占有土地,每个人只是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是土地的占有者。“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①

第二,建立在亚细亚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村公社自然经济。每个自然共同体(农村公社)的生产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简单的手工业结合,公社成员生产的目的不在创造价值以换取他人的产品,主要是为满足个人及整个共同体生存的需要及为生存再生产的需要。这种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方面使得农村公社完全能够独立存在,从而每个公社是一个独立封闭的实体;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形式只是满足于生存的不断重复生产,没有发展生产的紧迫需要和强大动力。

第三,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血缘关系。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每个人都离不开共同体,“就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每个人只有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他生存的一切。他和他的家庭,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土地上劳作。劳作过程的共同性,共同占有、利用土地的生产方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式,都决定了个人不能独立于基于血缘的共同体。他成为共同体锁链上的一环。同时,这种生产方式与宗法血缘关系互为因果:生产方式需要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又强化了这一生产方式。

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是东方古代社会的专制政治。马克思说:“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惟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②这个“更高的所有者”就是专制君主,他才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这成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② 同上书,第473页。



专制主义的基础,灌溉性农业和战争需要也成为专制主义的重要条件。

在这样的经济、政治背景下,古代东方文化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首先,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古代东方民族认为个体与本体、小宇宙与大宇宙是统一的,人要设法获得这种统一,将个体与大自然融合为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表述,印度则为“梵我合一”,阿拉伯则是“亲近真主”。

封闭的农业社会是“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土壤,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又是东方文化的基础。它是人合于天,而非天合于人。这种宇宙观表现在人的实践层次上又成为东方的人生观。它要求“顺天以和自然”,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而舍弃自我,超越有限的个体和有限的现实,追求永恒和无限本体,实现内在世界的宁静与和谐,成为东方最高的人生境界。

其次,思维方式的内倾化与直觉化。由于简单重复的生产,闭塞的社会环境和专制政治下的等级身份束缚,个人在外部世界发展的机会很少,对外在客观世界相对淡漠,收回目光转向内心,内省人的存在本质,形成东方思维的内倾化。这种内倾又以直觉、顿悟的方式表现。东方民族一般不像西方民族那样以科学理性来认识和思考对象,而是强调直观、内省和神秘的个人体验。东方的这种直觉化思维往往与宗教结合在一起,佛教的“悟”、伊斯兰教苏菲派的“神智”、老庄的“静观玄览”,都是直觉思维方式的不同表述。

再次,人际关系的伦理化、等级化。将“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及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也追求“和谐”。为达到社会的和谐,以维持共同体的长期延续,因而有各种各样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伦理规范,按各人的位置和身份规定其等级,人人在伦理化的等级范围内生存活动。当个体与群体矛盾时,要求牺牲个体以维护群体。

最后,生活方式的克俭无争。前述的宇宙观、人生观,思维方式和人际关系落实到具体的生活方式上就是克俭无争。讲求个人的自我修养,要求个人内省以明心见性,克制过分的欲念,顺乎天理,达到心物合一、空灵无我的境界。东方民族少自我中心、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和过分的物质享受追求。

上述四个方面可以用“东方精神”加以概括。这是东方古代社会基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而形成的文化一致性。这种文化的一致性成为东方文学统一性的文化心理基础,即东方文学的文化潜质。

“东方精神”作为传统,也深深烙印在东方的近现代文学之中。近现代的东方大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文化上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对抗也有交融。从总体趋势看,西方文化对传统东方文化有力的撞击和多方面的渗透,促使东方传统文化转型变革。但东方传统始终是东方文化的内核。

三、东方文学的基本特征

东方文学上下几千年,遗产丰富。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特定的传统和演变规律。不同时期的东方文学也有不同面貌。但东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在更高的层次上将其与西方文学比较而言,也可以把握其多元中的共性。

第一,多元发展,相互交流。

西方文学都以古希腊文学和基督教文化为源头,一脉相承地发展,近代多次产生遍及全欧的文学思潮。东方文学却具有多源性。上古东方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学各自独立发展,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到中古形成相对独立的三大文化圈的文学,各自具有独特风貌,形成东方文学的多元格局。

但东方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并非各自处于封闭状态,而是在交流中发展。上古时代的西亚两河流域有多种古代文明融合,希伯来民族文学就是古代巴比伦、苏美尔、埃及多种文明的结晶。中古三大文化圈之间的文学交流也很频繁,印度佛教对东亚文化圈的文学产生影响,梵文影响到中国音韵研究,从而促进唐诗的发展。中国文化和文学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阿拉伯世界,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文学也渗入印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诸国成为三个文化圈汇集的区域,印度文学与文化、中国文学与文化、伊斯兰文学与文化在这里交错渗透。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交流也不是始于近代。古希腊文化就有地中海东岸的西亚文化的因素。这从古希腊神话中可以找到痕迹。欧罗巴在希腊神话中是来自亚细亚的少女,宙斯化为牛把她带到欧洲,宙斯与欧罗巴的结合象征东方古老文化与希腊原始文化的结合。再如阿都尼斯本是巴比伦的植物神,表现原始初民对四季枯荣的思索。传到希腊后阿都尼斯变成了美神与死神争夺的美少年,宙斯只好裁定他一年中一半在冥府,一半在人世。他曾遭到情敌阿瑞斯的暗算,莎士比亚后来以此为题材写了一篇情焰升腾的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斯》。

公元前12世纪古希腊与波斯早有接触。希伯来的《圣经·旧约》成为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时期的“百年翻译运动”,不仅翻译了大量波斯、印度典籍,还翻译了一批古希腊的哲学、科学和文学论著。中国文化与文学对欧洲启蒙时期的文化与文学也产生深刻影响。近现代东方文学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和启发更是无需赘言的事实。

第二,偏重于表现,追求主体内在的主观真实。

东、西方文学都追求真实,但对真实的理解不一样,西方古典文学注重外在的客观真实,东方古典文学注重的是内在的主观真实。西方美学家托马斯·芒



罗将两者进行比较：“我们西方的趋势是要客观化和外化的内心生活，并给予外部对象和对它们的思考以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此相反，东方主观主义是要将注意力转向内心，而脱离感观现象世界。”^①因而中国有“诗言志”之说，印度的《韵光》（欢增著）提出“诗的灵魂是韵”，这里的“韵”是指诗作字面涵义背后的“暗示意义”，即诗人的主观真实。

东方传统抒情文学发达，几乎所有文学大国都以诗歌为文坛正宗。这是重主观真实的反映。就是叙事性文体，也是表现性的。东方传统戏剧，大都不是客观写实，而是写意性、象征性地表达主体理解的真实，表演中注重的不是情节，而是渲染一种气氛，极力表现融凝于气氛中的心境（如《沙恭达罗》林中送别一场，日本能乐《熊野》）。即使是一些看似客观写实的作品，理解时也要透过表层看作家的主体意识。《源氏物语》固然不乏对平安时期贵族生活的现实描写，但描叙这些不是紫式部的目的，她表达的是她本人对生活的悲苦体验以及由此升华的“物哀精神”。

第三，载道教化，惩恶劝善的文学观念。

东方传统文学有内倾避世的倾向，又有介入俗世、载道教化的倾向。这两个方面统一于东方伦理化、追求稳定和谐的文化心理。维护群体利益成为“善”的标准，诗人作家通过创作加以引导和教化。中国有“文以载道”的提法，《毛诗序》开宗明义，提出诗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印度最早的系统文论著作《舞论》中提出：“戏剧（泛指文学）将在各种味、各种情、一切行为和行动的表现中产生有益教训。……戏剧将导向正法，导向荣誉，导致长寿，有益于，增长智慧，教训世人。”^②阿拉伯诗论强调诗歌的技艺、修辞，但也重视诗作内容的善：“仅有优美的辞藻，而没有好的内容，那是有缺陷的，有如一首令人着迷的歌曲，应当是内容好，又辞藻优美，再配以动听悦耳的曲调。”^③

从文学创作实际看，东方古典的训诫文学、智慧文学、先知文学都是以一定的善恶道德观念评说对象、教导世人。《五卷书》、伐致呵利《三百咏》、萨迪的创作和阿拉伯的“劝世诗”都是这类作品。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宣扬的正法思想、中国《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宣扬的忠义观念，只要将它们与《荷马史诗》和司各特、大仲马的历史小说一比较，就能清楚看到东方作品的道德化色彩。至于宗教性作品，无论经典的“天启体”，还是后人解释性的“圣训”，其载

① 托马斯·芒罗：《东方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2页。

② 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③ 同上书，第494页。

道说教的特征更无须多言。

第四,民间文学的突出地位。

东方上古文学的主要部分来自民间创作,文人创作占极少部分,从现存的材料看,只有印度、中国、希伯来较早出现文人创作。现在传世的上古东方作品,大多是经后人搜集整理、编订加工的民间创作。体裁大多是神话传说、民歌民谣、史诗箴言、说唱故事等;结构形式上的故事套故事、散韵夹杂是民间说唱文学的痕迹;表现上常用朴素的比喻、突出夸张、传奇幻想等手法,也是民间口头讲述吟唱、突出效果、吸引听众的结果。上古东方文学的民间文学特色,深深影响了整个东方文学。

中古时期,东方的后起民族崛起,各自民族的民间文学丰富充实了东方中古文学,又一次强化了上古已经开始的民间文学特色的传统。日本的《万叶集》中的大量和歌、军纪物语《平家物语》,朝鲜的“乡歌”、三大古典小说,东南亚的《班基的故事》,泰国的《昆昌与昆平》,马来的《杭·杜亚传》,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安塔拉传奇》,波斯的《义士萨玛克》,土耳其的《乌古斯史诗》和非洲的史诗《松迪亚塔》等都是中古重要的民间文学作品。

由于近现代东方民族的觉醒,民族意识高涨,东方近现代作家在民族意识作用下,极力弘扬民族传统,同时向民间创作学习,挖掘民间文学精华。

东方民间文学的突出地位还表现在文人创作中。省先,不少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形式,是学习、借鉴民间创作,经过加工完善而形成的。如朝鲜的“时调”,阿拉伯的“玛卡梅体”,日本的“能乐”、“净琉璃”,中国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等。其次,一些文人创作取材民间文学,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创作成名著。“蕾莉与马杰农”是流传于西亚和南亚民间的动人恋爱故事,不少诗人运用这一题材写下了杰作,波斯的尼扎米、土耳其的富祖里、印度的霍斯陆都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著名长诗。

第五,和谐、温雅、恬静的整体艺术风格。

东方文学的艺术风格不同于西方文学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缺少西方文学中灵与肉的剧烈冲突所带来的高度紧张和无法解脱的痛苦,而是平静、优雅、中和、肃穆。和谐美是东方审美理想的核心。在文学领域,要求情感表达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含蓄隐晦,切忌直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为东方叙事文学的基本情节,也成为叙事文学的结构框架,往往是大团圆结局。人物形象也多属平和、中庸一类,难以听到怪异极端的“不和谐音”。

东方文学的艺术风格,也表现在对大自然的偏爱与描写上。大自然在东方作家笔下,不是人类的敌对力量,甚至不是探索的对象,而是赋予自然以灵性,在平等对话与灵魂的沟通中展示大自然的美与力。泰戈尔曾比较东、西方艺



术：“西方艺术或许相信人的灵魂，但是它并不相信宇宙万物有一个灵魂，而东方艺术相信这一点……于是在东方，我们不必追求细节，不必看重细节，因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普遍的灵魂。东方圣人为寻求这一灵魂而静坐沉思，东方艺术则通过艺术与圣人一起实现这一灵魂。”^①东方艺术追求“普遍的灵魂”是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和谐”，即宇宙万物的和谐。东方从古至今的大量山水诗、咏物诗，本质上体现的就是对“普遍灵魂”的信仰与对和谐美的审美理想的追求。

东方文学是多元的文学。上述特征的概括是从宏观角度就总体情况而言的。从纵线看，上述特征更切合东方古典文学。近现代东方文学受到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虽然东方作家努力复兴民族传统，但近现代东方文学的主流趋势是日渐步入世界文学进程，是一种与古代东方文学不同的新文学。当然，传统影响的痕迹还是深深烙印在新文学中的。

^① 泰戈尔：《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泰戈尔文集》（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4页。